

中山精神的擎旗人——宋庆龄与中国抗日战争

毛茅

【摘要】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场中国人民奋起救亡的民族解放战争。作为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在这场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战争中发挥了她独特的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抗日战争 宋庆龄 中山精神

抗日战争简称抗战，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抗战时间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至1945年结束，共十四年。^①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场中国全民族共同奋起救亡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都为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宋庆龄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一、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1年8月，旅居欧洲的宋庆龄为母奔丧回国，入住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寓所。在宋庆龄回国后的第二个月，早已对我大好河山垂涎三尺的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相继沦陷。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却疯狂逮捕和杀戮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宋庆龄目睹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忧心如焚，12月于上海《申报》发表了于国内外产生重大反响的《宋庆龄之宣言》，宣言指责国民党：“自日本侵略满洲暴行发生，两方迫于国难民意，不得不暂停同室之戈，……但

^① 百度百科

争论之焦点，乃为中委之分配与高位之人选。”^①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进入了局部抗战阶段。1932年1月27日深夜，宋庆龄在寓所与《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杨杏佛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时说：“日本人得寸进尺，气焰很盛，看来上海的战事是不可避免的。十九路军抗战情绪很高，如果上海发生战事，应当给予他们以支持，作他们的后盾”。史等人也表示了“万一战事发生，当追随夫人”的决心。^②果然，1月28日，日本侵犯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爆发，驻扎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不顾蒋介石要他们撤出上海的命令，立即率领全体将士奋起反击。

（一）亲临前线慰问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立即和数百万上海人民一起成为十九路军坚持抗战的坚强后盾。1月30日上午，宋庆龄与何香凝等顶风冒雪赴真如十九路军指挥部进行慰问。她与十九路军副总指挥蔡廷锴亲切交谈，热情赞扬十九路军英勇抗战，并对阵地上的官兵发表演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看到战士们穿着单薄，回沪后，她们立即发动捐制棉衣的运动，5天之内赶制全新棉衣三万多套，送往前线。2月6日这天正值大年初一，上午9时，宋庆龄再次和宋子文夫人张乐怡等人带了许多慰问品赴真如前线犒军，慰勉官兵奋勇杀敌。她还手捧拾获的敌军炮弹，站在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达她对十九路军抗战的支持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2月12日，宋庆龄第三次携带着慰问品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吴淞前线，慰问正在交战中的翁照垣旅。当翁旅长劝说她以后不要再到吴淞前线来时，宋庆龄说：“不到前线来看望你们，我心里总是不踏实，现在看到你们了，我放心了。”孙中山夫人的到来使广大官兵受到巨大的鼓舞，他们发誓势必抗战到底。

（二）创建国民伤兵医院

由于十九路军违命抗战，国民政府不仅不派兵增援，还拒绝拨发军饷和物资，使得官兵生活给养很差，药品奇缺。此外，仅有的医疗服务远不能满足需求，宋庆龄便和何香凝一起发动了募捐活动，呼吁各界援助舍身卫国的十九路军将士。

① 《申报》中华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三张）。

② 窦天培：《爱国报人史量才》，《江苏文史资料集萃》（文化卷），第37页。

她还与何香凝、杨杏佛等商议在后方筹办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伤兵医院。宋庆龄的爱国热忱和抗日立场受到全市人民的爱戴和支持，在宋庆龄感召下，黎照寰出借上海交通大学校舍——执信西斋，许多爱国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慰劳品和医药用品源源不断而来。当《申报》刊载“孙夫人宋庆龄先生创办之国民伤兵医院尚缺服务人员”的消息后，一时间中西名医、大批妇女、学生前往医院报名，愿意义务为伤员服务。一所完善的国民伤兵医院很快建成，用以安置和救护英勇负伤的抗日将士。在这所“民众自筹资金兴办的伤兵医院”^①里，宋庆龄不仅负责劝募医院的费用，而且亲自长时间地在医院工作，经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她亲身深入病房巡视慰问，向伤病员嘘寒问暖，亲手给伤病员送水喂药，并发动妇女筹集医院所需的被褥、床单、绷带等医疗物品，莫利爱路 29 号的住宅也被她本人辟出作为临时的仓库，并日夜不停地将这些物品运送至前线和各伤兵医院。为了丰富伤病员们的文化生活，宋庆龄捐赠了一批图书，还购置了唱机和唱片。针对伤员大都是广东人的情况，她特地选购了《小桃红》等广东乐曲为他们播放，用家乡音乐来安抚他们肉体上的伤痛，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此外，宋庆龄还常常在莫利爱路寓所耐心听取何香凝派来的黎沛华等人关于在上海公时学校等 4 处开办伤兵医院的工作汇报，并诚恳慎重地提出意见。

（三）支援沪西反日大罢工

在十九路军顽强作战之际，后方也形成一条战线——以沪西为主的日商纱厂工人同盟罢工。宋庆龄十分关注工人的抗日爱国斗争，当她得知工人因坚持罢工，吃饭、居住都存在严重困难时，就千方百计为罢工工人筹集了 2 万元经费，派秘书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公开群众团体“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取得联系，邀请该会秘密党团书记吴驰湘到莫利爱路寓所做客。在寓所，她询问了罢工工人的斗争和生活情况，并将筹集的 2 万元经费交给吴驰湘，请党组织把钱转交给沪西罢工委员会，用以支援反日罢工的斗争。

二、投身世界反战运动

宋庆龄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世界反帝大同盟是以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为宗旨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庆龄随即致电世界反帝大同盟，

^① 杨小佛：《宋庆龄和国民伤兵医院》，上海市政协文史委编：《抗日风云录》（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8 月版，第 247 页。

呼吁声援中国人民的淞沪抗日战争。1932年2月，宋庆龄致电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要求声援中国人民的淞沪抗战。2月29日，高尔基在《消息报》发表《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一文以回应，呼吁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援助中国。5月22日，宋庆龄与爱因斯坦、罗曼·罗兰、高尔基等世界著名作家和科学家联合发表告世界人民书，宣布将于8月1日在日内瓦召开国际反战大会，反对世界大战。8月27日至31日，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了第一次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35国代表近2000人出席。宋庆龄虽未能莅会，但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大会发表宣言，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正式成立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并决定第二次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在上海召开，宋庆龄被选举为反战委员会委员。

（一）主持远东反战大会

为筹备反战大会，上海各界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及远东反战会议筹备委员会成立。1933年6月18日，宋庆龄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鉴于当时的环境和形势，决定由宋庆龄以主席的身份公开出面筹备，而具体工作则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冯雪峰操办。7月28日，宋庆龄又以世界反战委员会中国代表的名义发表宣言，欢迎各界人士参加即将在上海举行的远东反战会议。远东反战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远东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和世界反帝反法西斯斗争的关系，会议在筹备阶段便遭到各大国的联合抵制，德国政府逮捕德国与会代表，日本政府积极消灭本国及其占领地的反帝运动，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当局以及法租界当局禁止会议在租界内召开；参与筹办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也大量被捕。在形势极端严峻的情况下，宋庆龄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8月6日，宋庆龄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声明，动员国内外人员积极支持和参加这次大会。国民党当局也极力阻挠该会的筹备和召开，8月18日，五名国际代表乘船到沪时，宋庆龄在秘书黎沛华的陪同下，蔑视不许外国代表登陆的禁令，亲自上船去欢迎他们。9月30日，远东反战会议在上海成功秘密举行，中外代表60余人参加。宋庆龄在甩掉特务的跟踪后抵达会场主持会议，并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和反战斗争》的演说，介绍中国反帝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再一次谴责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号召被压迫人民学习法国人民，俄罗斯工农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精神，并坚信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会议最后决定成立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宋庆龄被选为

主席。国际代表离沪时，大会筹备处散发了《欢送国际反战代表宣言》，对上海反战大会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况进行了报告和宣传，使世界人民进一步了解并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事业。这次会议对中国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斗争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二）抗议德国法西斯暴行

身为世界反战委员会唯一的中国代表，宋庆龄时刻关注着世界反帝反法西斯的斗争。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法西斯主义开始盛行。仅几个月的时间，希特勒法西斯政府就逮捕了数万工人、工人阶级领袖和知识分子，并用狂暴的手段进行野蛮的摧残。宋庆龄对德国法西斯的暴行无比愤怒，她发表了《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一文，并于5月13日上午，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来到黄浦路9号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抗议德国法西斯政府摧残民主自由和世界文明，强烈谴责德国法西斯对德国进步人士的迫害和对犹太人种族屠杀的暴行。1936年7月，西班牙爆发内战，8月，德意法西斯公然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随后，世界50多国志愿人士组成国际纵队，协助共和政府军对抗佛朗哥叛军。11月，宋庆龄等在中国妇女界发起援助西班牙妇孺的运动。西班牙内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前奏，就在世界大战的阴云日渐笼罩世界之际，由英法人士发起的国际和平运动迅速席卷欧美各国。这一运动在中国被称为“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也在1938年1月成立了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2月，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在伦敦举行以援华制日为主题的会议，宋庆龄向大会致电，呼吁世界和平力量援助中国反抗日本侵略。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以宋庆龄代表的名义与会，并任大会名誉主席，位居主席台。

（三）派代表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

1933年6月，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巴黎成立，宋庆龄被选为副主席。1936年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邀请宋庆龄参加9月10日在巴黎举行的扩大会议。当时宋庆龄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出国不便。她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后，决定委派中共地下党员，时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党团书记钱俊瑞代表她前往巴黎参加这次会议。钱俊瑞启程之前，宋庆龄两次约他到寓所晤谈，请钱代表她在会上呼吁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宋庆龄嘱咐他道：“你应当好好准备一

下,多搜集些材料……说明我们在这里的斗争同欧洲各国人民的斗争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休戚相关。全世界人民都应该起来反对法西斯……”

9月10日,钱俊瑞按照宋庆龄的指示出席了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罗曼·罗兰等在会上多次赞扬宋庆龄对国际反法西斯运动、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参加完会议回到上海的钱俊瑞到宋庆龄寓所向她汇报了欧洲之行。

三、组织抗日救亡团体 唤起民众团结抗日

从1931年起,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东北地区爱国军民的奋勇抗战和上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推动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打响第一枪之后,迅速挺身而出,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进步力量支援中国抗日;另一方面,她在上海领衔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参与组织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抗日爱国救亡团体,她起草文稿,发表抗日救国主张,反对蒋介石政府的独裁统治,营救爱国志士,号召民众团结抗日,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成为中国抗日民主运动中的一面旗帜。

(一) 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2年12月29日,为了捍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权主义思想^①,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为中国“有组织的人权保障运动的开端”^②。宋庆龄、蔡元培分任主席和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1933年1月7日和30日,上海、北平相继成立分会。同盟以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为宗旨,以“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援助,并调查监狱的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与唤起社会之公意;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起奋斗”^③为目的和任务。同盟在宋庆龄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国民政府专制统治的斗争,以及抗日反帝活动,并声援了国际民权运动,先后营救保护了许多“政治犯”和进步

① 刘家泉:《宋庆龄传》,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

② 王金铭:《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页。

③ 陈漱渝,陶忻《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人士，如许德珩、廖承志、陈赓、罗登贤、陈独秀、邓中夏、丁玲、潘梓年等许多中共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

（二）组建国民御侮自救会

1933年3月4日，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直逼华北，华北危急，全国人民抗日情绪迅速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团结抗日反帝力量，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联合上海三十多个进步团体，主持发起了一个范围更广的抗日救亡团体——国民御侮自救会。3月8日，“国民御侮自救会”筹备大会在上海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各社会团体代表、知名人士、新闻记者60余人莅会。宋庆龄在会上被推选为会长并发表长篇演说，她谴责了热河省省长汤玉麟开门揖盗的罪行，明确指出对于这种卖国行为应负责任的是“蒋介石政府”，“因为这个政府用它的主要军队打中国的人民”，并且，“不肯武装人民，不肯组织义勇军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①而后号召抗日群众团结起来，一致奋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反对一切阻碍民族革命战争进行的罪恶企图。“御侮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募捐、接济东北义勇军等活动，对人民进行抗日宣传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筹建武卫会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坚决主张对日抗战，为了动员全国各界、各种力量投入抗日斗争，拯救中华民族，193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对此宋庆龄积极响应。4月20日，她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议上以会长身份，宣读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在宋庆龄的威望感召下，6月20日，她与何香凝领衔率1779位原国民党左派和各界民主人士联名将上述“六大纲领”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为题予以公开发表，提出了“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各界广大群众与海外侨胞和团体的广泛响应，公开签名赞成者达十万人，形成了一个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群众运动。通过这一运动，使全国各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制定“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方针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7月12日，宋庆龄领衔签名发表了《中国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民族武装自卫会宣言》，建议成立由各界代表组成抗日领导机关。8月1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宋庆龄亲任主席，此后该委员会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发表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为对日作战宣言》，其中进一步阐述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号召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宋庆龄建立抗日武装组织的行动，严正地表明了人民独立武装抗日的决心，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无疑是一个挑战和沉重的打击。

（四）组织救国会

蒋介石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使得日寇有恃无恐，1935年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攫取平津，进而侵吞整个中国。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及时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宋庆龄、何香凝等率先响应，引起全国的巨大反响。在《八一宣言》的影响和宋庆龄的积极支持下，同年12月，由北平爱国学生掀起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抗日救亡运动由此重新走向高潮；与此同时，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也不顾当局禁令，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救亡团体纷纷成立。为了把分散的各救亡团体联合起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号召和组织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宋庆龄等30人被推选为理事会理事，负责上海的抗日救国活动。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40余人被选举为执行委员。救国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①从此，抗日救亡运动有了一个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全救会的成立，实现了全国各地救亡团体的大联合，并使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有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力的推动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发展。宋庆龄“是全救会的带头人，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前列，她全力以赴，支持全救会的斗争，”^②使全救会成为抗战前夕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

1936年6月14日，救国会向全国人民发表紧急通电，要求“全国民众，自应群起响应”，“一致向外，抗日战争，立即展开”。还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六项措施。史良称赞宋庆龄“是救国会的中流

① 《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页。

② 《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

砥柱”。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莫须有罪名，在上海非法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史称“七君子”事件。沈钧儒等人不久即被解往苏州关押。宋庆龄得知消息后立即展开了营救活动。26日，宋庆龄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的名义发表了《宋庆龄先生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领袖被捕声明》，抗议国民党违法逮捕救国会七位领袖。她还两度致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请其帮忙营救。1937年6月25日，宋庆龄与何香凝等联名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要求释放沈钧儒等，宣布愿同服“爱国罪”，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宣言中提到：“沈先生等犯了什么罪？就只是犯了救国罪。救国如有罪，不知谁才没有罪？”7月5日，宋庆龄拖着病体，冒着酷暑与胡愈之等12人来到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同服“爱国罪”。7月31日，在宋庆龄等人积极营救、各界人民的支持下，国民政府最终将“七君子”无罪释放。

（五）积极参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 发起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

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宋庆龄被推举为理事。宋庆龄积极参加和支持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救亡工作。“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在其机关报《救亡日报》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积极宣传抗日。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庆龄与何香凝等人发起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何香凝任主席，宋庆龄等人被推举为理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发动妇女“和男同胞共赴国难”，“一致起来抗敌”。该会成立后，组织领导和团结上海各妇女团体开展了抗日救亡工作。8月4日，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响应宋美龄在南京发起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改名为中国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宋庆龄仍任理事。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后，妇慰上海分会在宋庆龄与何香凝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救亡工作，包括开办护士训练班，组建妇女救护队在伤兵医院、在抗日前线辛勤工作。在两个月中就训练出2千名临时护士。许多妇女、工厂女工、交际妇女、女学生和女童子军都并肩在火线上一起工作。8月23日，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担任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的常务理事，积极动员上海各界妇女开展献金运动，宋庆龄和何香凝一起通过“上海妇慰分会”发动妇女认购达2千万元。10月，妇慰会积极响应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发起的募集20万双手套的运动，宋庆龄把自己募集的490元交给文协救护

组，还自己出钱雇了两辆卡车，作为到前线接送伤兵之用。该会在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救亡运动中，动员各界妇女参加救亡运动发挥了很大作用。

为了获取国际援助，9月17日，宋庆龄发表《致英国工党书》吁请工党支持中国抗战。10月20日，在上海美商R.C.A.广播电台向美国人民发表英文演讲《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0月下旬，鉴于抗日形势日渐严峻，毛泽东、周恩来从延安来电请宋庆龄撤离上海去香港。当时，宋庆龄还有些工作要处理，表示稍缓些时间再走。11月12日，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上海，上海沦陷。宋庆龄寓所附近除了有经常出没的密探外，又多了一些前来监视的日本特务。此时，中共中央再次来电，催促宋庆龄赶紧离开上海去香港。宋庆龄表示感谢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心，工作已处理得差不多，可以离开上海。宋庆龄交代完事宜后，于12月23日，与保姆李燕娥、外籍友人路易·艾黎避开日伪警察、宪兵的监控与盘问，登上了开往香港的邮船。

（六）创建保卫中国同盟

当时，国际上美、英、法等国政府仍然对法西斯势力妥协，实行“绥靖”政策；国内抗日战争进入了持久的阶段；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敌后根据地，正面地迎击着日本侵略军，以粗劣的武器抵抗着强大的敌人，尤其在医药物资和器械上极其短缺，“需要帮助这个军队建立药品和器械库”。^①时代在呼唤，必须要有一个政治态度鲜明但又不属于任何政党，能为战胜法西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而广泛团结海内外一切力量，冲破蒋介石政权设置的障碍，竭尽全力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救援机构。这个机构还必须特别熟悉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海外有关机构和个人）之间的桥梁。当然，这样的团体还需要一个最恰当的领导人。因此在周恩来的建议下，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架设起争取国际援助的桥梁。保盟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它是由中国人领导的，但其会员则是国际性的，它在香港时期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和在重庆时期的第二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大量的国际友人。这些不同国籍不同信仰的人们，首先是通过宋庆龄，这颗“中国的良心”，在她伟大人格和思想的影响下，正确地认识了中国革命的现实，进而看到了当时并不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却代表着中国的光明和未来。

^① 《保盟通讯》第一期。

保盟成立后，积极从事“国际范围内筹募款项，进行医药工作、儿童保育工作与成立工业合作社等活动”。为支援中国抗日，宋庆龄领导保盟以义演、义卖、举办画展等多种形式在海内外大量募集物资和款项。保盟是宋庆龄从事战时救济工作的媒介，在争取国际援助、从事救济工作的同时，它 also 通过定期出版各种刊物的形式，向全世界宣传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宋庆龄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并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援助。她强调要将援助重点放在拖住大部分日寇兵力的敌后游击队。她还反复向全世界指出，中国人民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前列，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呼吁世界和平和进步力量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同保盟的其他领袖一起，向海外朋友发出公开信，再次提醒世界要认识到中国战场的重要性，支援中国这一阻挡日寇向全世界侵略扩张的唯一屏障。

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世界各国自发组织起很多民间团体支援中共抗日，宋庆龄领导保盟与其中 100 多个组织建立了联系，她还亲自与各国援华组织的领导人联系，同他们会面，商谈援华工作，给他们写感谢信。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也以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积极投入支援祖国抗日的活动。宋庆龄曾在广州出席华侨抗日动员总会的代表大会，并对华侨作抗日总动员的讲话。她还亲自致函爱国华侨个人及华侨爱国团体，感谢他们的爱国热忱。

同时，宋庆龄还以她高尚的品质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吸引和团结了众多国际友人，共同为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而奋斗。她帮助和安排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到抗日前线。牺牲在中国战场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大夫和印度医生柯棣华大夫都是通过保盟帮助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德国医生米勒大夫也是在保盟帮助下，来到延安加入了八路军。著名的八路军德籍女少校王安娜从保盟创建时起便是它的成员，1939 年春，她接受宋庆龄委托担任保盟驻重庆代表，负责运送物资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美国医生马海德于 1936 年 6 月被宋庆龄推荐，和美国记者斯诺一起前往苏区考察，之后他留在苏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宋庆龄领导保盟在救济难童、援助抗日根据地的医药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以及帮助难民生产自救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抗日战争烽火燃遍中国国土时，数以万计战灾儿童的命运牵动着宋庆龄的心，她不仅参与宋美龄主持的战时儿童

保育会，还亲自发起救济难童的运动，向全世界呼吁“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

保盟的救济工作是站在抗日统一战线的立场上开展，宋庆龄既反对党派之见，也反对无原则的中立。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物资最为匮乏，她将援助重点放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和平医院就是经过宋庆龄向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争取，在海外援华机构的支援下建立起来的。

保盟援助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倡导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1938年，宋庆龄的老朋友、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记者斯诺夫妇等提议，在非敌占区开展工业合作运动，组织因战争而失业的工人和难民进行生产自救，支援中国抗战。这一计划刚一提出，就得到了宋庆龄的极大支持。宋庆龄亲自担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委员会以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工合国际委员会在成立之后成为了工合运动实际上的领导者，它连接起海外的工合推进机构与国内各地的合作社，为后者送去源源不断的捐款和物资。宋庆龄曾在香港组织了各种募捐活动，为帮助工合协会建立工业合作社募集资金。其中的“一碗饭运动”最早是由美国的一些援华机构在美国发起的，后来扩展到英国、加拿大、南美洲等许多国家。宋庆龄把这一运动迎进到香港后，为“多买一碗饭，多救一个难民”，香港出现了争吃“爱国饭”的场景。1943年，河南发生特大灾荒，宋庆龄立即领导保盟在重庆发起“赈灾国际业余足球义赛”，募捐所得悉数交付“豫灾赈济委员会”。后来这笔捐款一部分被用于灾民安置，一部分被河南工合组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救济灾民生产自救。

四、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搭桥 维护共同抗日局面

华北事变后，鉴于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英美帝在华利益及蒋介石的统治地位面临严重挑战。蒋介石在加紧“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同时，也不得不寻求机会与中共接触，探讨进行政治谈判的可能性。1935年底，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之一约见了宋庆龄，向她透露了国民党最高方面愿与中共谈判，商讨国共联合抗日的信息。宋庆龄认为蒋介石的这一意愿是符合历史潮流和国家民族利益的，与中共的《八一宣言》的主张也是相一致的，便欣然同意出面斡旋。她在寓所与共产党人潘汉年、周恩来等晤面，为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搭起了一座桥梁，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为国共两党传递信息

1936年初，宋庆龄请以牧师身份在沪从事中共秘密工作的董健吾带着她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赴陕北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中共中央收到宋庆龄的信后，经过缜密研究，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原则。3月，董健吾携此密件返沪后亲自交给宋庆龄，宋庆龄又通过宋子文把上述意见转告给了国民党中央。这样，经过宋庆龄的努力，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终于再次接通了。从此，两党高层间恢复了政治接触，为国共两党的正式谈判创造了条件。4月，宋庆龄会见了中共中央从陕北派到上海的冯雪峰，仔细听取了他传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通过这一渠道，宋庆龄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同年9月18日，毛泽东致函宋庆龄，高度赞扬她继承孙中山革命救国之精神，并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央委员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毛泽东在信中特意介绍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请接洽，予以批示”。同时，还请她把比较接近的国民党中枢人员介绍给潘，就建立统一战线问题进行晤谈。^①宋庆龄不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殷切期望，多次与潘汉年、冯雪峰等商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工作，并把他们引荐给宋子文、宋美龄等。她还多次会见宋子文、孔祥熙、吴稚晖、孙科等人，耐心说服他们接受联共抗日主张，敦促国民党当局放弃“剿共”政策，使国民党中央内部逐渐形成了一股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力量，为促成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二）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的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西安扣留蒋，希望蒋介石“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宋庆龄得知消息后，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提出了在蒋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条件下释放蒋的真知灼见，并亲自在寓所用英文打字拟就声明，明确表达了力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之后，她又与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代表潘汉年联系和了解情况，还介绍潘汉年赴南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页。

京，促成了宋子文、宋美龄的西安之行，并最终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三）全力支持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成为了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宋庆龄积极响应中共关于团结合作、一致抗日的建议，在国民党要人中积极工作。1936年10月20日，宋庆龄与何香凝共同起草关于遵守孙中山遗嘱，再次实行国共合作的提案书，并在国民党中央人员中征集签名。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张静江、孙科等14人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上签字。1937年2月，该案递交给蒋介石。2月15日—21日，国民党为商讨对中共方针及对日政策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2月18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在沪各外国报纸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公开信，对提案作进一步的说明，并附上提案全文。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侵占平津后，企图侵占上海，而后进攻南京。一时间，“亡国论”甚嚣尘上，针对这种情况，宋庆龄发表一系列言论，并于8月在外媒发表了《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呼吁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坚信中国必能收复失地，指出日本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让人们坚信：“中国是不可征服的！”7月下旬，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就国共合作事宜进行会谈后飞抵上海。宋庆龄听取了周恩来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在看过《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9月22日，国民党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9月24日，宋庆龄撰写了题为《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又称《国共合作之感言》），对国共两党以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感动得几乎要下泪”。11月6日，宋庆龄发表《两个十月》，再次表达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的高兴和期望。同月宋庆龄又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支持第二次国共合作。

（四）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不久，在全民抗战的高潮中，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强调全国抗战力量应在

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共同抗战。宋庆龄与何香凝随即联名发表文章表示拥护，并向国民党中央和全党同志提出停止党派斗争、严惩汉奸等七点建议。10月，在汪精卫之流大肆反对抗战、鼓吹对日求和时，宋庆龄曾联合何香凝等联名上书国民政府，斥责汪精卫等的消息言论，要求立即发动全国力量一致抗日。

1940年2月，宋美龄为治疗因车祸而引发的创伤，从重庆来到香港疗养，并与在上海沦陷后移居香港的两个姐姐团聚。当时，“伤兵之友”运动正在全国开展，但香港应者寥寥，作为“伤兵之友”征求队名誉总队长的宋美龄到港后积极推动各爱国团体参与运动，得到了宋庆龄的带头响应。宋庆龄提议成立香港“伤兵之友”运动会，并提议由宋蔼龄担任名誉会长。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也参与进来，为救护伤兵募集捐款，并负责审核所有账目，还特意捐款500元港币用于行政管理开支。为了向公众显示团结抗战的坚定决心，3月31日，三姐妹在南京汪伪政府宣告成立的次日，联袂同机从香港飞抵正在日寇狂轰滥炸之下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在重庆的一个月里，她们一同关心妇女儿童、巡视市区、参观防空设施、慰问伤兵等，并出席各种盛大欢迎活动。然而，国共合作虽已实现，双方却一直摩擦不断。宋氏三姐妹联袂访渝时，正是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所以宋庆龄在重庆时不断有记者就此向她发出询问。于是，宋庆龄回到香港后发表《渝行观感》一文，表示国人应该坚定团结抗战的意志，勿为让亲者痛、仇者快之举。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宋庆龄又与何香凝等联名上书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剿共”部署，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宋庆龄高举中山先生旗帜，怀着一腔爱国热忱，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为抗战作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在历时十四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宋庆龄始终抱定中国必胜的信念，走在斗争的前列，她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支持上海两次淞沪抗战，起草文稿发表抗日救国主张，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战；她组建和参与各类民间抗日团体，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她主持远东反战会议，抗议法西斯暴行；她结交国际友人，促进中国革命；她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坚定的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她以自己崇高的声望和特殊的身份地位，不畏艰险，殚精竭力地奔走呼号，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力促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创建保卫中国同盟，动员全世界和平民主人士支援中国抗日，为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赢得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赞扬和爱戴。

作者简介：毛茅，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文博馆员。